

“一带一路”战略下 企业境外投资税收风险评估 ——基于 Fuzzy-AHP 模型

□ 李香菊 王雄飞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对影响企业境外投资的税收风险因素进行量化评估，结果显示：企业境外投资税收风险总体较高，而政治法律环境指标数值依次高于其他指标数值；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时，政治法律环境、经济发展状况、税制差异和税收管理风险程度将决定税收风险的高低。鉴于此，我国政府应制定符合“一带一路”发展需要的国际税收协调规则，实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等；企业也需要创新思路，因地制宜地选择“走出去”路径。

关键词：“一带一路” 境外投资 税收风险 模糊层次分析

DOI:10.19376/j.cnki.cn11-1011/f.2017.02.002

伴随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推进，国内资本流动正经历从“引进来”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行的双重转换，更多的企业将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相关国家的经济活动。据统计，2016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145.3亿美元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①然而，企业境外投资井喷式增长的成功率却不超过50%，海外矿业收购失败率更是超过80%。^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使“走出去”企业不得不对地缘政治、经济环境、法律道德等风险；税制和征管水平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因此，如何建立一个科学、高效、可控、易操作的风险评估机制，对于减少企业境外投资税收风险，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相关文献回顾

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是为了适应特定时期的政治法制、经济发展、社会需要而建立，并随其发展

而不断变化的。企业境外投资税收风险的发生与东道国发展的综合环境密切相关。陈展(2016)认为，我国“走出去”企业在参与海外项目投资时，应充分了解东道国错综复杂环境下的税收制度和政策，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税收风险发生的概率。孔丹阳(2016)通过研究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对“走出去”企业的调查情况，指出目前无论是集团管理层还是境外机构，对税收风险都不够重视。陈天灯(2013)、廖沂(2014)、霍志远(2016)分析了国际税收风险管理的先进经验和具体案例，结合我国税收风险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加大信息管理支撑力度、建立税收风险监控体系、完善“走出去”企业税收管理法律体系以及转变理念等措施。

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合作方面，杨思灵(2015)、邹磊(2015)指出我国与部分沿线国家存在双边互信不足、人文交流有限、领土争议等问题，而且有的节点国家恐怖活动频发、政治动荡，企业在这些地区投资将承受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互利共赢”是沿线大部分国家积极呼应“一带一

① 商务部. 2016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 [EB/OL]. (2017-01-19) [2017-02-14].

<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fwydy/tjsj/201701/20170102504239.shtml>.

② 凤凰网财经. 中国一季度海外并购：商务部数据与国外统计差6倍 [EB/OL]. (2016-04-21) [2017-02-14].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421/14338682_0.shtml.

路”的重要原因,也是这些国家与中国展开合作的动因。然而,沿线大部分国家经济和非经济风险偏高,主权信用风险高企(彭秀坤,2016),法律体制不完善等,对“一带一路”的建设也提出了挑战。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走出去”企业境外投资的税收风险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风险研究则多集中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税收方面的定量研究则相对缺乏。为此,本文通过数理模型定量地研究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时的税收风险及影响因素,试图为新常态下企业“走出去”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参考。

二、税收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设计及模型应用

(一) 税收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设计

税收风险的发生源于企业境外投资与东道国政府目标(政治、经济、社会)的不一致性和内部环境的复杂性。一方面,由于彼此之间存在着合作竞争关系,东道国政府为了鼓励境外投资者,往往会提供一些税收优惠措施或者补贴以吸引境外企业。然而,作为一种“综合要素”,外商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若企业海外投资行为影响了当地政府目标的实现,东道国政府便会对跨国企业的经营环境进行各种干预,通常会采用税收政策来减少国外企业投资对本地企业的挤出效应以及控制当地经济资源能力造成的威胁。另一方面,企业在综合环境良好的国家进行投资,税收风险隐患相对较小;在局势动荡、政权更迭、恐怖活动频发的国家投资,税收风险发生的概率将显著提升。东道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税制结构、征管水平等是衡量企业境外投资税收风险的主要因素。

根据《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①、《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6)》内容,以及对陕西省财政厅、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工作人员,高校专家,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会计咨询服务的会计事务所,境外投资企业财务主管人员等40余人就税收风险相关问题的访谈、归纳后,我们设计了税收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如下表所示。

表1 企业境外投资税收风险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一级指标)	方案层(二级指标)
企业境外投资税收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政治法律环境 A_1	东道国行业投资限制政策 A_{11}
		东道国政治环境 A_{12}
		双边税收协定 A_{13}
		母国税收政策 A_{14}
		东道国税收政策 A_{15}
	经济发展状况 A_2	债务问题 A_{21}
		经济增速 A_{22}
		贸易开放度 A_{23}
		外汇平行市场 A_{24}
		通货膨胀 A_{25}
	社会文化观念 A_3	税收管理观念差异 A_{31}
		税收文化 A_{32}
	税制结构 A_4	货物劳务税为主的税制结构 A_{41}
		货物劳务税与所得税并重税制结构 A_{42}
		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 A_{43}
	税收管理 A_5	投资融资架构筹划 A_{51}
		风险评估 A_{52}
		免税重组筹划 A_{53}
		收购累计亏损公司筹划 A_{54}

(二) 税收风险评估模型的应用

本文借助模糊数学(Fuzzy)(Zadeh,1965)和层次分析法(AHP)(Saaty,1980),把影响企业境外投资税收风险的定性评估转换为定量评估,以便更准确地反映风险状态的本质和整体发展变化的特性,对税收风险进行全面评价。模型的构建步骤如下:

1. 评价对象指标集。

设有n个评价指标,则 $U=\{U_1, U_2, U_3, \dots, U_n\}$ 。根据税收风险的影响因素,建立企业境外投资税收风险评价对象集U,即:

$U=\{U_1, U_2, U_3, U_4, U_5\}=\{\text{政治法律环境, 经济发展状况, 社会文化观念, 税制结构, 税收管理}\}$

2. 评价方案的评语等级论域。

$V=\{V_1, V_2, V_3, V_4, V_5\}=\{\text{高, 较高, 中等, 较低, 低}\}$,每个等级对应一个模糊子集。本文对评判结果采取加权求平均值的方法进行模糊处理,用

① 《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由美国PRS集团编制并发布。本文借鉴其2015年综合指数因子进行指标设计。
指南详见: <http://www.prsgroup.com/>。

中位数的具体数值代表该区间范围内评判等级风险的大小,计算出风险评价的具体数值(如表2)。

表2 企业税收风险评价等级量化表 单位:分

评判等级	高(H+)	较高(H)	中(M)	较低(L)	低(L-)
区间范围	85-100	70-85	55-70	40-55	40以下
区间中位数	92	77	62	47	20

3. 确定指标权重集。

各层指标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来构造各个层级的判断矩阵。利用每一层级的判断矩阵计算出该层级各个指标的权重值。在 $LW=\lambda_{\max}W$ 式中, L 为判断矩阵, λ_{\max} 为 L 的最大特征值, W 为 L 对应于 λ_{\max} 的权向量, w_i 为相应元素层次单排序的权重值。

$$w_i = \frac{1}{n} \sum_{j=1}^n \frac{a_{ij}}{\sum_{k=1}^n a_{kj}} \quad (i=1, 2, 3, \dots, n),$$

计算 w_i ,得到权向量 $W=(w_1, w_2, w_3, \dots, w_n)^T$ (1)

4. 模糊综合评估。

构造等级模糊子集后,从每个因素 $U_i(i=1, 2, 3, \dots, n)$ 上对被评事物进行定量研究,求得模糊关系矩阵 R :

$$R = \begin{bmatrix} R & | & U_1 \\ R & | & U_2 \\ \dots & & \dots \\ R & | & U_n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r_{11} & r_{12} & \dots & r_{1m} \\ r_{21} & r_{22} & \dots & r_{2m}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r_{n1} & r_{n2} & \dots & r_{nm} \end{bmatrix}_{n \times m} \quad (2)$$

关系矩阵 R 中第 i 行、第 j 列元素 r_{ij} ,表示某个被评事物从 U_i 对 V_j 等级模糊子集的影响程度。

权向量 W 与关系矩阵 R 相乘,得到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向量 B :

$$B=W \times R \quad (3)$$

利用评价结果向量 B 与评语等级 V 的乘积,得出目标层和准则层各指标的最终得分,即:

$$\text{score}=B \times V^T \quad (4)$$

根据模型运行机理,利用公式(1)(2)(3)(4)对各级指标进行计算,^①结果显示:企业境外投资税收风险评估得分为83.9分(较高风险);政治法律环境、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文化观念、税制结构和税收管理指标的得分依次为86.0分(高风险)、82.6

分(较高风险)、73.2分(较高风险)、79.8分(较高风险)和77.1分(较高风险)。

三、企业境外投资税收风险实证分析

根据模型计算的结果,我们采取逆向推导法对各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较高税收风险存在的实际原因。在考虑沿线国家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②

第一,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环境是衡量税收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依据2015年的全球清廉指数(CPI)^③对其进行分析,沿线65个国家的CPI得分均值为39.6分,低于全球CPI均值43分。其中,西亚、北非17国和中东欧16国的CPI得分为40.8和49.6,接近或高于世界CPI均值;东南亚11国、南亚8国的CPI均值分别为37.2分和36.3分,略低于世界CPI均值;中亚与独联体的CPI数值分别为20分和28.8分,较世界均值有一定的差距。

衡量政治法律环境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地缘政治风险。利用ICRG指数对沿线48个样本国家的地缘政治风险分析后发现:地缘政治风险处于较高等级以上国家所占比重达47.9%。具体而言,中东欧地区地缘政治风险最小,仅为4.4%;东南亚、南亚、中亚和独联体地缘政治风险相对较高,分别为13%、26%、17.4%、8.7%;西亚、北非国家多处于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战争频发地段,该地区比重达到了30.5%。通过研究发现沿线部分国家的腐败和地缘政治风险较为突显,由此产生的政治法律环境问题将影响其税收政策和双边税收协定,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投资者的经营所有权。

第二,经济发展状况同样是影响税收风险的主要因素。根据《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6)》提供的相关数据,分析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筑类投资领域所面对的经济类和非经济类风险(见表3)。在新加坡、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投资面临的经济和非经济风险相对较低;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伊朗的经济风险较高;菲律宾、

① 由于篇幅限制,具体计算过程略,感兴趣的同志可与作者联系。

② 李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风险评估[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

③ 透明国际制定的全球清廉指数(CPI)旨在通过腐败指数的排名来建立公众对腐败议题的关注,引导各国政府关注由于他们在腐败指数排行榜上排名过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促请采取有效行动制约腐败问题。详见:<http://cpi.transparency.org/>。

印度和越南的非经济风险则偏高。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决定其税收规模和结构。经济发展状况良好的国家,税制结构相对更合理、税收规模与环境更稳定,税收风险发生的概率也较低;反之,风险较高。因此,企业在沿线进行大型基建类项目投资时,应尽量选择经济基础扎实、偿债能力强以及非经济类风险低的地区或国家。

表3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经济与非经济类风险情况

国 家	经济类风险(名次)		非经济类风险(名次)
	经济基础	偿债能力	社会弹性
新加坡	1	1	1
哈萨克斯坦	2	2	3
俄罗斯	3	3	4
印 度	4	6	5
菲律宾	5	8	8
马来西亚	6	5	2
越 南	7	9	7
印度尼西亚	8	7	6
巴基斯坦	9	10	10
伊 朗	10	4	9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6年)》筛选整理,名次越靠前,表明风险越小。

第三,税收方面的原因也是导致风险发生的因素之一。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不仅要面对政治法律、经济社会风险,还会遭遇税收管辖权不同、税收协定陈旧带来的重复征税和税收饶让不足等风险。同时,企业既要适应沿线国家之间税制结构的差异,又要谨慎使用税收筹划措施,防止被东道国列入刻意避税的黑名单,还需妥善处理当地税务执法部门的歧视性对待以及转让定价调查等一系列税收问题。其中,就税制结构差异而言,沿线国家企业所得税税率差异较小、整体税负适中,有利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具体来看,经济欠发达国家企业所得税税率与经济发达国家差异不大;个人所得税税率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差异较明显;增值税税率则大同小异。从实际税负考虑,经济欠发达国家的税制透明度、附加税费以及征管水平普遍低于经济发达国家,名义税率与实际税负存在一定的差距。以我国为例,

增值税税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均值,并且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与沿线部分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上述国家名目各异的种种税收问题导致的税收风险需要我国企业予以重视。

四、企业海外投资税收风险防控措施

为降低政治、经济、文化、税制结构、税收管理差异等因素产生的税收风险,促进“走出去”企业在境外的顺利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 制定符合“一带一路”发展需求的国际税收协调规则

应根据发展的需要,适时调整或制定符合“一带一路”发展需求的国际税收协调规则。调整或制定国际税收规则并非要推翻现有的国际税收体系,而是在现有规则下,借鉴OECD关于BEPS行动计划的最新成果,制定符合发展需求的国际税收协调规则。该规则至少能体现沿线区域内未来税收利益的协调分配、涉税争议协商和税收征管合作水平等。基于实际情况考虑,建议结合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税收制度等方面的特征,设计针对性的协调规则。例如,考虑到沿线国家在税制结构、税负、征管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在税收利益分配原则方面,我国可以对沿线低税负国家适度让渡税收利益,而向高税负国家争取更多的税收利益。

(二) 实施支持开放经济发展的友好型税收政策

“一带一路”为我国实施开放型经济发展格局创造了条件,必将推动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加速“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步伐。但沿线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税收协定陈旧等问题的客观存在,增加了企业的税收风险。建议从我国税制和税收征管实践出发,结合“一带一路”的发展规划,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调节要素的跨境流动。一方面,考虑到我国税制结构和企业所得税税率与沿线国家的差异,建议改革税收抵免制度,将现行的“分国限额抵免”改为“综合限额抵免”,允许企业向前结转抵免限额,提高企业境外所得税的实际抵免额,并将其逐步推广到各类“走出去”企业;另一方面,早期与沿线国家签订的协定中,大多没有税收饶让条款,即便存在也多是对方国家单边给

予我国饶让,我国承担的饶让义务较少,使国外的税收优惠常常处于失效状态,影响了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建议税收服务要积极地“走出去”,加快沿线国家间税收协定的修改完善进程,将税收饶让条款作为重点内容予以补充完善。

(三) 探索优化纳税服务新途径

“走出去”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中除了上述的种种税收风险外,还会因制度、文化、信仰、习俗、语言等“水土不服”次生出新的税收问题。我国税务部门应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创新方式,主动作为。一是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数据库,认真研究收集沿线国家与“走出去”企业相关资料和差异情况,建立综合数据库,为国内企业“走出去”提供咨询信息服务。二是设立税务参赞。可借鉴美、日、韩在我国派驻税务参赞的做法,在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比较热门的沿线国家驻外使馆设立税务参赞,或者赋予驻外使馆商务参赞相应的职权,由其统一协调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涉税事宜。三是“量身定制”个性化税收服务。指导成立专业中介机构,聘用具有相关国际税收经验的人员,依据拟“走出去”企业或已“走出去”企业的需要,有偿开展“一对一”培训服务,解读境外投资经营政策和税收问题,架起征纳沟通的桥梁。

(四) 揆情度理地选择“走出去”模式

政府的引导扶持是“走出去”企业化解税收风险的重要支撑,但政府的作用只是重要的外因,企业自身的内因才是关键。企业“走出去”前必须备

足功课,认真考察了解东道国和当地的政策法规、社情民意、风俗人情、投资特点等具体状况,充分结合企业自身的情况,评估各种风险承受能力,有选择进行投资;企业应转换思维方式,以全新的理念和思路进行纳税筹划,避免固化思维模式、以国内的标准衡量解决沿线国家复杂的税务问题;企业还须从组织机构、业务流程、信息沟通等方面顶层设计事前、事中、事后风险评估机制,培养储备精通财务、税收、外语的复合型风险管理人才,将近期安排与中长期目标相结合,主动把握税收风险,为企业应对税收风险提供软、硬实力支撑。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6)[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 [2] 邹磊.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 [3] 陈展, 徐海荣, 兰永红. 税收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有关问题分析[J]. 税务研究, 2016(3).
- [4] 孔丹阳, 王宝杰. 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从树立税收风险理念开始[J]. 国际税收, 2016(4).
- [5] 陈天灯. 构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体系研究[J]. 管理世界, 2013(6).
- [6] 廖沂, 杨林林. 企业“走出去”税收遵从风险与应对分析[J]. 国际税收, 2014(12).
- [7] 霍志远, 杨雷东. 我国“走出去”企业税收风险管控的思考[J]. 税务研究, 2016(11).
- [8] 杨思灵.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治理及挑战[J]. 南亚研究, 2015(2).
- [9] 彭秀坤. “一带一路”下防范主权信用评级风险的法律对策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6(1).
- [10] Zadeh L.A. Fuzzy Sets [J].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1965(8).
- [11] Saaty T.L.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M]. New York, USA: McGraw-Hill, 1980.

Assessment of Tax Revenue Risk of the Chinese Corporate Overseas Investment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i Xiangju and Wang Xiongfei

Abstract: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evaluates the tax risk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of the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Fuzzy-AH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ax risk of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is totally higher, the value of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environmental indicator is more significant, and the level of tax revenue risk depends on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environmen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ax system difference and the tax management risk for the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formulate 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tax coordination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mplement the tax policies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economy, and the enterprises should have some innovative ideas to choose the “going out” paths according to the lo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verseas investment; Tax risk; Fuzzy-AHP

作者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责任编辑: 李妮娜)